

# 砥砺奋进40载 赓续三国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位于成都城南的武侯祠，肇始于公元223年刘备归葬惠陵，至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积淀，是全国现存唯一君臣合祀祠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1961年，成都武侯祠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4年，成都武侯祠文物保管所成立；1984年6月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正式建馆；2008年，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24年6月28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建馆40周年。

40年来，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始终致力于守护传承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现如今的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以惠陵、汉昭烈庙和武侯祠为核心组成，占地230亩，分为文物区、西区、锦里三大功能区，既是以厚重历史和名胜古迹闻名的“三国圣地”，更是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示、社会教育、文创产业、古典园林为一体的三国文化专题博物馆，是成都、四川乃至全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地标。

面向新时代，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全面对标国际一流博物馆，深入贯彻让文物“活”起来和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战略方针，紧密围绕国家及省市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重点工作，各项事业得到高质量发展，在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和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新时代博物馆建设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 孜孜以求 深入研究 学术研究取得高质量成果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最重要的基本职能之一，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立以来，科研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大，从大到精，逐步发展为三国文化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力的一方重镇。作为国家文物局授牌成立的“全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武侯祠博物馆开展的“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是国内首项三国文化专题文化遗产调查科研项目；开办的《看历史（三国文化）》是国内首家三国文化主题学术期刊。

同时，武侯祠博物馆不断提升文化阐释能力，陆续出版《全国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报告》《名垂宇宙——诸葛亮文化遗存调查》《工整的华章》等学术著作、图录50余种。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过厅

## 深挖历史 多元交互 陈列展览讲好三国故事

展现四方之珍馐，传承文化之精髓。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通过完善制度、创新理念、实践探索，建立起一套以原状陈列为核心，基本陈列为基础，临时展览为特色，交流展览为媒介的展陈体系，陆续推出、引进了一系列主题鲜明、题材新颖的展览精品，曾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项目”等多项全国奖项。

“明良千古——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展”“祠庙千秋——成都武侯祠历史文化主题展”等精品常设展览将专业性、历史性、艺术性融为一体，让更多人走进三国文化。

以“大三国志”“龙吟希声——三国戏曲艺术展”“义薄云天——关公主题精品文物展”为代表的特色临展，精炼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彰显出古代中国文化魅力和影响力。

此外，武侯祠博物馆不断拓宽三国文化沟通交流渠道。“万古云霄一羽毛——书画中的诸葛亮”等原创展览巡展多城，让三国文化在不同地区间碰撞激荡。

## 传承文化 赓续文脉 宣传教育让三国文化深入人心

传承三国文化火种，照亮“博物之路”，赓续历史文脉。武侯祠博物馆的宣传工作始终围绕国家文博事业发展战略和省市文化建设方针政策，围绕观众及广大三国文化爱好者关注热点和兴趣指向，不断开拓宣传渠道，实现电视、平面和网络三方媒体平台持续聚焦、跟进的宣传效应。

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武侯祠博物馆积极在全国大中小学建立馆校合作，打造“三国书院”社教项目，年均开展活动超1000余场，年均参与人数超10万余人次，并获评“第二届全国文博社教优秀案例”等多项国家级奖项。

为了传播经典文化到社会各界，武侯祠博物馆通过招募和特聘相结合的方式组建“文化志愿者”团队，并特别成立“孔明送东风”志愿服务小分队，开展文化传承进校园、文化宣讲进社区、文化帮扶进山村主题志愿活动，曾获评“全国博物馆志愿服务典型案例”。

为吸引更多青少年走进三国文化，武侯祠博物馆与中国文物报社、bilibili平台，历时三年，共同摄制《大三国志——守望与发现》纪录片。该片以



明良千古——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展



“三国书院”社教项目



武侯祠成都大庙会

三国时期的蜀汉代表人物为样本，打破历史时空隔阂，用现代年轻人的视角、喜闻乐见的创新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

# 考古出土(出水)陶瓷文物 保护修复工作的思考

王双超

长期以来，大量考古出土(出水)的陶瓷文物都采用了考古型修复，即对破碎的器物进行简单的清洗、粘接和石膏补配处理，其目的主要是便于考古工作者开展器物类型学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对于文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物修复师应尽可能提升文物修复的效果，挖掘文物的价值内涵，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促使文物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 考古出土(出水)陶瓷文物特点

出土(出水)陶瓷文物表面往往附着各类沉积物。出土陶瓷文物的附着物主要包括石灰质、石膏质、硅质和氢氧化物等；出水陶瓷文物的附着物主要包括海洋环境侵蚀形成的铁质硫化物、碳酸盐类化合物、海泥质沉积物以及珊瑚类的海洋生物附着物等。

出土(出水)陶瓷文物破损严重，病害情况复杂。出土陶瓷文物在埋藏环境中受生物、化学侵蚀、窑室坍塌等外力因素影响，一般存在破碎、缺损、裂缝、附着物等病害，出土后部分器物经过简单考古修复处理，修复不当、修复材料老化问题严重；出水陶瓷器受海洋埋藏环境影响，大多存在破碎、缺损、裂缝、海洋生物附着物等病害，又因常年浸泡在海水中，可溶性盐进入器物内部结构，随着环境的改变，可溶性盐会发生溶解重结晶反应，从而造成器物釉面剥落、返盐、胎体酥松、纹饰漫灭等。

出土(出水)陶瓷文物携带的信息较为丰富。一是文物本体信息，即器物本体的物质构成、造型、纹饰、历史痕迹等，结合SEM、XRF、热释光等现代科技手段，还可推测文物的表面微观结构、烧制时间及产地、窑口、特殊工艺等；二是器物埋藏环境和器物内容物，埋藏环境如土壤、海水及其他化学、生物因素影响等，内容物如木炭、果实、骨骼、牙齿、钱币等，对此类信息的解读可以了解文物所处时空的社会环境、文化习俗、自然环境等。

## 考古出土(出水)陶瓷文物 保护修复现状

考古修复一般要求具备快捷、简便、准确的特点，因而对出土(出水)残损陶瓷多采用简单的临时性修复处理办法，主要目的是恢复器物造型上的完整性，以便后期开展器物类型学研究、发表考古发掘简报等。经考古修复的器物通常不利于文物后期展示利用及修复整改，

具体表现如下：

安全隐患方面。考古修复使用的粘接材料多为虫胶、502、AAA胶等，这些胶体抗老化性能弱，易变形、变色、脱落等，当器物胎釉结合较差时，胶体会深入胎体内部，再处理难度大；考古修复使用的补配材料多为石膏，石膏质地疏松、吸湿性强，在较大面积使用的情况下，会增加器物的不稳定性。此外，部分考古编号的标记难以清除，不仅会影响器物观感，还会对器物釉面及胎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修复理念方面。考古是一项偏重于研究的工作，器物修复也是服务于相关研究。考古修复一般不注重修复尺度的控制，存在修复不当或修复过度的情况，如粘接错位、补配范围过大等；修复工艺往往也较为粗糙，只做清洗、粘接和补配，不进行作色补绘；表现形式更偏重于突出器物真实性，艺术性与可读性较弱，如器物小面积的石膏补配，容易使观众过于专注补配部位，忽视器物本体及整体所传达的各类信息。

专业程度方面。受主客观环境影响，考古修复的人员往往非专业修复出身，有时可能身兼数职；器物修复前很少进行价值及病害评估，从而制定合理的修复技术路线；修复中对当前的科学技术和手段缺乏有效利用，针对性不足；修复过程中缺少有效监督管理和质量控制；修复完成后缺乏规范的结项流程等。

## 新时代陶瓷文物的保护修复要求

安全性。应针对出土(出水)陶瓷文物的价值内涵和病害情况，制定科学的保护修复路线；修复过程中应严格控制修复范围，坚持最小干预，避免修复过度；修复材料应具备稳定性和易再处理性；修复完成后要进行效果跟踪，确保修复质量等。

科学性。应借鉴当前成熟完善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理论成果，借助相关的科学仪器进行检测和修复，如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拉曼及红外光谱分析法、3D扫描打印等，全面掌握出土(出水)陶瓷文物所携带各项信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有针对性的修复材料和技术手段。

可展览与可读性。根据考古出土(出水)陶瓷文物保存现状，采取个性化修复方式，提高文物展示利用水平，确保陶瓷文物生产、使用、保护等过程及文物价值等信息更容易被观众观看和理解。

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要综合考虑文物

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观众观看文物的视觉焦点，对于残损程度较轻、胎釉结构较稳定、艺术价值相对较高的瓷器，可采取复原修复，突出呈现其艺术价值；对于残损严重的陶瓷器，从兼顾真实性与艺术性的角度出发，进行补配随色处理。

## 考古出土(出水)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建议

对考古发掘的陶瓷文物要尽快予以处理。考古发掘现场保留了文物最原始、最真实的信息和证据，有助于了解文物保存环境和病害产生原因，现场修复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也可以及时解决；反之，将发掘的文物打包后长期放置于座席，容易造成部分信息流失或发生变化，也可能导致陶瓷片丢失或难以拼对，从而加大后期修复难度。

对陶瓷文物历史修复痕迹要进行科学整改。首先要明确修复痕迹是否影响文物本体安全及主要价值呈现，其次要看历史修复痕迹是否具有修复史等方面的特殊价值。要结合文物保存实际情况和历史修复所蕴含的价值，有针对性地对这些修复痕迹进行处理。其中，对于已经大面积石膏补配的器物，应在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再决定是否要整体重修或是局部整改。

对与陶瓷文物有关的资料要进行全面收集。一是与器物来源有关的文献资料，有助于了解器物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并通过器物的历史照片和考古线图，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依据；二是与器物同时代同类型器物的相关资料，可以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借鉴，确保补配、作色、补绘等修复过程的规范合理；三是器物历史修复资料、其他相关研究资料等，能为文物价值研究、修复史研究、展示利用方式等提供基础资料。

确保陶瓷文物保护修复全过程的专业性。修复前，要进行文物价值研究和病害评估，制定有针对性的修复技术路线。修复过程中，要避免不当修复或修复过度；修复时可采用新技术、新材料解决器物大面积缺损、造型纹饰复杂等问题；修复应坚持真实性与艺术性统一，可展览与可读性统一，尽可能达到现阶段最佳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效果。修复的关键环节应邀请专家进行修复指导和质量控制。修复后，要完善文物修复档案，履行规范的结项程序，执行效果评估和跟踪反馈工作，确保修复的质量。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 文物保险·凝聚社会力量保护文物的探索

吴彦宇

6月7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江苏按察使署旧址举行的“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主题活动中，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科技保护专项基金向苏州当地捐赠了一年期不可移动文物保险。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文保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文物风险评估、文物保险机制设计、科技保护技术手段、苏州的文保经验、公众科普和协力社会发展等相关话题各抒己见，为文物管理机制创新提供了思路。

文物保险“防重于赔” 由于历史原因，文物保险在我国处于长期缺位，投保率较低的状态。2021年，福建省文物局率先试点“文物保险+服务”项目，开创了政府、商业保险、专业科技公司共同参与的文物保护新模式。2022年国家文物局发文鼓励“文物保险+服务”补齐管护短板，提出防重于赔，创新思路制定保护方案。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甘肃等地相继给文物上了保险。除了提供风险保障外，保险企业还通过“文物保险+动态监测”“服务+保险”等创新模式最大程度地保障文物的安全。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杨广立认为，“文物保险+科技+服务”的模式，让保险公司及专业技术平台给文物保护单位找疏漏、上设备、织密防护网，为每个文物量身定做安全可靠的保护方案，降低了文物建筑的风险。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科技保护专项基金副主任李晓武认为，保险的参与可以为文物保护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减轻政府的负担；科技的应用可以提高文物保护的效率 and 准确性。文物保险可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参与，形成多方合作的局面，开创新的产业。

保险为文物构筑“防火墙”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保险产品的功能不仅是事后赔偿，更重要的是事前风险防范、事中风险控制。目前，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多，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面广量大，安全监管的压力较大。此次为江苏按察使署旧址定制的一年期不可移动文物保险，就是助力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道“防火墙”。

江苏按察使署旧址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自明代以来就是官衙重地，曾先后设立江苏水利分司署、按察分司、兵备道署、提刑按察使衙门等，在承担官署职责的同时，也孕育了众多名人遗迹，是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场所。

2023年10月始，相关方以江苏按察使署旧址为试点，量身定制了不可移动文物修缮保险方案和技术服务说明，并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科技保护专项基金牵头捐赠的方式，实现了该保险方案的最终落地。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此次获赠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保险总保额730万元，保险责任涵盖不可移动文物意外损毁责任、文物场所第三者责任和文物维护责任。承保期间，保险人将聘请专业公司使用文物巡查

## 创新探索 丰富体验 文创促进历史与现代交融

自1984年开设纪念品小卖部、茶社、糖果糕点铺起，武侯祠博物馆走上文创产业的发展之路。40年间，在持续的创新探索下，三国文化与现代生活越来越紧密相连。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在提炼三国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打造了“武侯祠成都大庙会”“三国季”等品牌活动，将三国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其中，“武侯祠成都大庙会”曾获评首批“最具中国特色传统庙会”。

将三国文化巧妙融入新奇创意中，让其绽放出新的时代光彩。近年来，武侯祠博物馆推出了诸葛羽扇纶巾杯等多款深受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丞相咖啡等自主品牌店，丰富文旅消费场景。目前武侯祠博物馆已注册包括“武侯祠”“锦里”等在内的220余枚商标以及多项版权作品，以提升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 数字变革 面向未来 文化保护与观众服务取得新突破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作为三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利用新技术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打造面向未来的数字博物馆。建设文物数字化勘察测绘及保护管理系统，为古建筑、彩塑画、石质及金属文物等建立高精度、多维度的数字档案。借助三维数字化手段制作虚拟漫游，实现智能导览，推出“大三国志云展览”“成都武侯祠数字文化之旅”等交互浏览体验数字文化服务，让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云上观展，为三国文化的传播注入新活力。利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流媒体等新型技术，实现博物馆动态监控、实时监测和预警、智能调度、安全防护等智慧化管理，为公众提供个性化、品质化、交互化、沉浸式的智慧化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

忆往昔，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将不断坚定历史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继续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面提升文物科学管理和文旅融合水平，努力建成集三国文化收藏、研究、保护、展示、传播、交流、体验与产业发展为一体的高水平、现代化博物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守护，薪火相传，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贡献。

专用设备，每季度对投保文物进行安全巡查，将文物病害数据上传至巡查系统，使巡查人员能够及时判断文物风险的变化动态及发展趋势，做好防范；为了促进公众的保护意识，保险人将聘请行业专家每半年开展一次文物保护讲座，并提供数字化体验互动。

多管齐下加强预防性保护 围绕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来自文保和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了交流和讨论。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研究员王立平认为，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一些理念和思路也正在发生改变，“以前讲的是‘抢救第一’，现在我们的抢救工作基本完成了，所以提出了‘预防性保护’，强调‘治未病’。保险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实践。”

“如何减少古建筑风险发生以及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有经济保障，把经济风险转嫁出去？显然，保险是这种风险管理的最为传统、有效的措施。”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绪瑾认为，保险在古建筑风险管理上确实能发挥重要作用，但仍需要汇集各方的智慧，细化和完善相关的条款细则，比如标的范围、验审流程、赔付方式、附加险种等，切实消除各方顾虑。

李晓武介绍了科技与文物保险的具体结合方式，“通过科技的手段，能够比较精准地识别到文物面临的风险，比较精准地预测风险发生的方向以及安全的模式，提高对风险的管控。”

苏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研究员尹占群认为，文物保险的推出符合当前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有着一定的行业基础，但还需做足基本功，建议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在这个切入点上能够兼顾各方利益，保险就能做得起来，能够形成示范效应，被广泛认可。”

上海建为历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伟民认为，可通过建立公募基金的方式为文物保护筹集保险费用。“一个是借鉴长城的修缮项目，建立全国募捐模式，发起众筹；另一个是使用者付费，谁承租了这个房子，保险就由使用者支付。此外，保险公司也可以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以微利的形式甚至公益的模式参与进来。”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部副部长汪万福主持座谈交流，他认为文物保护不同于传统的保险理赔，不仅要集中保险以及文物保护领域的力量，还需要政策法规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形成理论和体系。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文物保险+科技+服务”的融合模式为探索文物管护创新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对文物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该模式的全面推广，还需在政策引导与支持、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以及创新保险产品等方面多管齐下，凝聚社会合力，提供更多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确保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保护和传承。